

东陆



学库

宏观经济增长与货币流通调控

杨斯迈 魏 力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东陆学库》缘起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东陆大学创办于1922年,至今已有七十余年了。七十余年的发展,经历过许多光辉。尤其在三、四十年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仿照“清华模式”,致力于高水准综合大学的建设,先后聘请了一大批名家执教云大。顾颉刚、楚图南、吴文藻、冯友兰、费孝通、白寿彝、潘光旦、刘文典、尚钺、向达、吕叔湘、姜亮夫、吴晗等等,一时英才荟萃,蜚声海内外。1946年,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1980年和1986年该书两次修订再版,云大仍跻身其中。

与自己学校深厚的历史相比,云南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年轻的学术出版机构,社龄不过校龄的十分之一。但云大出版社沾润学校深长的学术传统,以弘扬学术、推进文明建设为己任,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孜孜以寻自身立足学界的社会价值。

正如名校要靠名师的支撑,办好一个大学出版社,必然要以优秀的学术著作作为社的标识和旗帜。学术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事业,学术著作的出版并非囿于一地、一隅之功,云大出版社也应放眼全国,出版一批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于此萌发了建立东陆学库之想,旨在收集一批治学严谨、功力较深、在各学科范围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逐渐形成规模、贡献于我国的文化积累和现实开拓。

这一想法于1995年提出后,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得到了

1998/08

中国社科院章建刚先生及我省陈庆德先生、杨先明先生的支持。诸位先生四处为我们奔波组稿，劳力劳心、精神令人感动。特别还要提到，本学库的设立得到昆明万兴房地产公司的支持。公司总经理温宁军先生也是学界中人，曾就读于云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从事实业，并卓然有成，然未忘情学术，并深知其对社会的意义，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慨然相助，使经济实力不强的我们能最终开始这一事业。

《东陆学库》的建设将是我社的一项长远工程。于此发轫之时，简叙其缘起以告读者。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

序 言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时科学地指出，货币是再生产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创立“国家干预经济”学说的凯恩斯称货币是“联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

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精巧机器”的银行体系和中央银行制度，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有证据显示，财政（非金融分配）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下降，金融分配的作用上升并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既成为每个周期经济过热、信贷膨胀、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也成为每次“刹车”和经济整顿的重点和众矢之的。

经济增长是广义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理论认为，不仅消费资料生产是商品生产，而且生产资料生产也是商品生产；同样，不仅两大部类产品生产作为最终产品生产，而且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都属商品生产时，商品生产的范围因此扩大了。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不仅作为实物的物质产品生产可产生国民收入，而且参加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劳务也同样产生国民收入时，这就从生产的角度拓展了国民收入的范围。广义的国民收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体现的。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是财政、信贷介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后所引起的经济现象。从社会再生产过

程中游离出来的闲散资金，经过储蓄、投资以及通过再生产过程外部注入资金的方式，或者经过财政收支的非金融分配，或者通过银行信贷集聚和金融再分配，通过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关系达到货币均衡和经济均衡，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购买力在其余缺单位之间的有偿让渡，称为信用授受的金融活动。金融的基本载体是货币，没有适量和价值稳定的货币，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资金流量和资金存量是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中，资金流量是资金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货币流通中不同于资金流量。金融资金流量是以金融部门为媒介在国民经济各经济部门之间融通的资金流量。金融从浅层走向深化的过程，会使某些金融资产（信用凭证）逐渐地增强其流动性而跻身于信用货币行列，从而扩大了货币的来源和增加了货币供应的弹性。银行体系具有通过派生存款机制创造存款或资金流量的独特功能，但该功能的正常发挥是和健全的中央银行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资金流量问题主要研究各经济部门的资金来源、运用，资金的余缺、融通；货币流通主要讨论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等问题。资金流量运动与货币流通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显著特征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社会资金流量格局的重组。国内生产总值（GDP）经过财政的非金融分配，首先形成实物资金流量，然后经过金融再分配成为流入金融部门的资金流量。非金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是金融再分配中问题的“源头原因”和“深层次问题”所在。

本文设定和论证了合理性的金融调节的最终目标是“双目标”的货币政策——寻求适度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最佳结合的货币政策，论证了“通货膨胀无害论”不适合我国国情。金融体制改革，应使货币政策以政策工具为导源，通过操作指标、中介目标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政策传递和影响的过程，应以专业（商

业) 银行的利益机制为依托。

服务于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金融理论和实践活动, 其货币需求理论所依据的是严格遵循费雪公式或剑桥方程式, 将货币流通速度视为不变的常量, 只注重货币承担的流通和交易职能, 而忽视马克思所强调的货币同时具有贮藏及其他职能。根据实证研究, 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 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 而是变数, 有减缓的趋势, 且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与国民经济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本文不追求在货币需求计量模型中得出精确的“货币必要量”, 而是预测总体的“货币需要量”。

分析表明, 货币供给理论既需要理论基础, 也需要制度基础, 二者缺一不可。中央银行制度是货币供给理论产生的制度基础, 信用创造学说是货币供给理论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分析了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 由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 在每次经济过热—收缩的周期中, 信贷膨胀、通货膨胀、社会资金严重短缺是表象, 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经过财政等非金融分配后形成的国民可支配收入 (NDI) 短缺, 储蓄投资差的转化不力, 社会资金需求过分旺盛形成强劲的货币发行吸纳效应才是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探索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时认为, 只有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加大力度, 并使之分工明确协调配套, 才能把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产生货币供给适应货币需求的良好宏观调节效应, 达到货币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境界。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社会总供求平衡与财政、金融的关系	(1)
1-1 商品概念的扩展与国民收入范畴	(1)
1-2 国民收入和广义的国民收入	(7)
1-3 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及价值运动	(12)
1-4 经济增长与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20)
第二章 资金流量与货币流通	(29)
2-1 资金、资本、货币、货币资金	(29)
2-2 借贷资金运动	(33)
2-3 社会资金流量运动	(35)
2-4 货币流通的形式及渠道	(52)
第三章 货币政策	(59)
3-1 正常货币流通的标志	(59)
3-2 货币政策的目标、指标和传导机制	(68)
3-3 我国货币政策理论的探索	(98)
第四章 货币需求及其计量模型	(116)
4-1 货币量的构成和分层	(117)
4-2 几种货币需求模型的表述差异及综合	(122)

4-3	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确定	(139)
第五章	货币供给调控	(149)
5-1	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沿革	(149)
5-2	货币供给过程	(155)
5-3	货币供给模型	(174)
5-4	外生因素对货币供给函数的影响	(182)
第六章	货币均衡	(212)
6-1	货币均衡及其条件	(212)
6-2	货币失衡的原因	(226)
6-3	中央银行干预条件下的货币均衡	(235)
参考书目		(250)

第一章 社会总供求平衡与财政、金融的关系

1-1 商品概念的扩展与国民收入范畴

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时间维度上不断保持动态平衡。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总产品生产与社会总体有效需求的平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首先对这一平衡公式的左边提出了社会总产品（商品）的理论范围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等号右边的需求不是实物的、生理的要求。

由于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对社会总产品（商品）的范围理解不同，因此各宏观经济总量的计量范围不同，作为宏观调控信息来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同，这妨碍了理论的展开和深入。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评论这方面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界论战的情况，只能述及截止到目前为止国内理论界相对一致的结论，并站在理论巨人已有结论的阶梯上，登堂入室，升华提高。

研究金融和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或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论，都不能离开国民收入问题，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哪种商品生产能产生国民收入？商品的构成内容如何？这些成为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在1978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经济理论界不承认生产资料

是商品，认为只有消费资料是商品，又由于购买消费资料是居民的现金交易，所以在金融领域将现金流通与货币流通混为一谈。当时虽然认为生产资料不被视为商品，但其交换和流通过程也必须贯彻等价交换原则，鉴于国外某些权威理论已有定论，即教条地称生产资料是“只具有商品的外壳”。不过这种既非马、列原意，也无理论深度的定论在1978年以后已被绝大多数人放弃了，承认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一起，都是作为实物的商品。1978年以后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建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践活动接着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理论问题：劳务属于不属于商品的范围？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商品的范围？如何理解“物质生产是创造国民收入的源泉”？这问题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物质平衡表核算体系”（MPS）的规定，国民收入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所创造的新价值”^①。其数值为该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价值减去同期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等于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工资、农民和个体生产者收入）及生产单位的社会纯收入（利润、税金、利息等）的总和。^②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定义，国民收入是对国民从经济活动中所得到的商品和劳动的货币价值的计量”^③。不仅物质生产部门创造国民收入，非物质部门也创造国民收入，因此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在全年一切经济活动中从劳动、资本、土地所取得的各种所谓生产要

①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② 参见褚葆一主编《经济大辞典（世界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③ [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素收入（薪金和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的总和。^①

这两种不同的国民收入概念的根本分歧在政治经济学中归结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然而在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中大家注意到：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如同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必须投入一定的劳动，其中既包含物化劳动也包含活化劳动；虽然非物质性服务的消费不同于产品的消费，但服务与产品是完全可以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的。例如在生产条件的分配、劳动的投入、交换和货币、收入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方面，它们之间是无法区分的。在货币财政、信贷等等领域更看不出它们的区别。

非物质部门的收入分配、信贷、财政收支关系、货币占用等等，都构成了宏观经济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如果收入调节和收入政策、需求管理、储蓄和信贷、货币供应、财政收支不考虑非物质部门，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

基本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条式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概念与新引进的概念同时并存而未加区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包括非物质部门生产增加值的总量指标，与此同时却继续使用原有的“消费”指标，后者仅包括物质性产品的消费，不包括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服务的消费。这两种意义的消费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很不相同。由于消费概念界定不清楚，储蓄也不清楚，不要说广义的国民总储蓄，就是居民储蓄存款，其增长变化也常常超出经济界人士的预料：1989年经济不景气，国民收入总量增长幅度大大放慢，肯定影响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各收入主体的收入水平，并进而影响消费和储蓄水平，但当年居民存入银行的货币总量却出人

^① 参见栾一主编《经济大辞典（世界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预料地高，这是基本概念混乱造成宏观调控信息混乱的最典型事例。那些批评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概念掩盖了劳动创造价值和掩盖了剥削关系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没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质就在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问题不在于在一些具体层次上的经济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存在否定它们的理由，恰恰是需要通过科学的抽象力，一层层剥离这些外在形式，最终揭露出剩余价值关系。马克思强调，如果因为某种经济形式或概念模糊了价值或剩余价值，因而就必须废止的话，那么马克思就不该使用“利润”、“平均利润”、“地租”、“利息”等范畴。

国民收入概念，即使仅仅限于物质生产部门，也是一种比利润、利息、地租更高层次的转化形式。因此其模糊价值关系的程度更要严重得多。但是如果考虑到财政信贷的再分配，考虑到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等等，纯粹限于一国范围的国民收入可能还要简单得多。而所有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有时间的话，马克思本来是准备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展开到这些更具体现实的层次上来的，因而后来实际成书的《资本论》仅限于“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这个较深本质层次。如果马克思还有时间的话，他势必会继续剖析“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债的信用”、“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①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他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精髓，是英国人称之为“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其他具体形式，他希望别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②

某种经济理论中的国民收入概念是否反映了某种客观经济关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35页。

系，关键在于能否在一定层次上将非物质部门的劳动及产出与物质部门的劳动及产出统一起来。

“服务”到底是否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是持两个定义的观点。当马克思把劳动只是作为使用价值；把货币作为只具有执行其流通手段和职能的货币，把交换价值转化为某种使用价值，而不是货币变成资本时说：“服务不是生产劳动，服务的承担者也不是生产劳动者。”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把任何形式、任何条件下的服务统统说成是非生产劳动。然而，当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上考察生产劳动时，他认为这种规定同劳动的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①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属性来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凡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服务劳动，并为国家提供税利者属于生产性劳动，否则属于非生产性劳动。

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分歧的焦点是非物质生产领域究竟是否创造价值；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创造的价值当然要核算，但转移到其他部门实现的价值也要核算，它所关心的是对总量的核算，要求既不重复，又不遗漏。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上讨论的问题。综上所述，仅把直接生产过程或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看作是生产劳动，而把服务劳动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全面的。

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开创时的理论框架，是力图说明国民收入的变动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就业量，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国民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5～106页。

收入的生产量来扩大社会就业量，因此，它对经济的分析是从国民收入的流量与均衡分析开始的。该理论把国民经济分成四大部门：即企业（生产的决策者）、居民（消费的决策者）、政府（经济干预的决策者）以及国外（以上三个部门对外国的交易），同时把经济活动分成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交易，由此把对国民收入与支出的流量关系视为社会资金流量的运动而加以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社会资金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一个范畴；从统计的角度，它则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资金总量的具体反映。这两个不同层次概念的区别，这就是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包括不包括劳动价值的问题。

关键在于劳务和物质产品在再生产中有如下共同点，因此劳务的价值应列入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去：

第一，作为劳务或服务的产品仍然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劳务和物质产品一样，具有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价值费用，也有交换价值。”^①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态。

第二，与物质产品一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劳务（或服务）都具有商品的性质，要通过交换（等价交换），要用货币去购买。

第三，不论是劳务还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社会劳动必须按一定比例分割，这就包括在劳务和物质产品之间合理分配；为了保证“劳务”的再生产，社会必须对劳动进行价值和实物的补偿，而劳务的再生产必须具备再生产的条件。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160页。

即使是非营利性劳务产品也应包括在社会总产品中，这是基于：其一，非营利性劳务品，不产生利润，但它们消耗了社会劳动，这可以说仍具有价值形态；其二，这部分劳务品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用财政拨款的资金购买，然后提供给全社会的，这部分财政拨款实际上是社会对非营利性劳务品购买的预付。为了区分于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中“社会总产品”范围上增加了劳务价值这一部分，我们将之定义为“国民总产品”。这样，国民总产品 = 物质产品 + 劳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在经济实践中创立和丰富、发展的。如果把“服务”当作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把服务看作是生活资料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具有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它和其他物质产品的消费品一样，要用收入来支付、购买，那么，服务同样属于第Ⅱ部类。社会总购买力（用于生活支出部分）要和消费品加劳务（服务）的总额相平衡。这样，劳务（服务）的价值一部分在本部类实现，一部分在第Ⅰ部类实现，一部分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内实现。因此，过去认为服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

1-2 国民收入和广义的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所代表的是新增加的价值，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新增长的综合表现。它在宏观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在这里。所以只有它才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最真实的综合指标。它不像社会总产值（统计指标定义为“国民总产值”，下同）那样包含着物质消耗的价值；而且也比国民收入加折旧的社会最终产值（统计指标定义为“国民最终产值”，下同）优越，因为折旧基金属于补偿性质，并不反映经济的新增长。有人只把国民收入视作是分配问题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国

民收入首先是生产问题，然后才是分配和使用，三者应该是相等的，即西方经济学中称之为产值、收入、支出三等价。假如出现了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那就是作为超过国民收入本期实际生产额的分配，实质就是货币分配额超过了国民收入实物量。这种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过大，而出现了求大于供的缺口。

如果不是按要素收入加总，而是按市场价格计算国民收入，将间接税考虑在其中，就会得到一个包含着间接税的总量概念，通常称为“国民生产净值”，有时也被定义为“国民可支配收入”。任何一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非要素收入，最突出的是政府的间接税。间接税的存在可视为是对要素收入的挤占，因为如果设有间接税，劳动者和生产者不是在收入分配环节而是在使用环节被政府以间接税的形式扣留了一部分本来应当属于他们的收入。由于间接税是包含于市场价格之中的，而计算国民收入又以市场价格为最基本的依据，因此按市场价格计算国民收入，就会得到一个包含着间接税的“国民生产净值”的总量概念。

折旧基金的提取，是作为企业的一项非要素收入而被运用于储蓄或直接投资，形成毛积累（或称总积累）的一部分。由于研究资产损耗的价值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难以与要素收入或国民收入划清界限，因而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将国民净产值与固定资产损耗（折旧额）相加，称之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值），GNP指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广义国民收入的。

国民生产净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于各种要素收入加总而形成的国民收入，内容都有所扩展，但又由于都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通常被视为广义的国民收入。广义国民收入与狭义国民收入相比，虽然内容不一致，但是主体是相同的，因而具有统一的发展变化规律。在统计核算和宏观分析中，这些概念

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的可能性，而且各自都为对方的确定提供着有利的条件。从统计的简便性来考虑，广义国民收入，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对说来最易获得的数据，具有统计成本低可靠性高的特点。

如果加入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生产国际性的因素，狭义或广义国民收入概念必须严格区别“国内生产”与“国民生产”。按照属地原则，国内生产是指在本国领土内发生的生产活动，既包括本国的生产单位的活动也包括外国在本国的生产单位的活动，这种意义上产生的国民收入称国内生产净值（本国领土内由本国和外国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全部要素收入的总量概念）和国内生产总值（与上述属地原则相同的全部要素收入和非要素收入的总量概念）。国民收入、国民生产净值、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关于一国生产单位在国内外获得的全部要素和非要素收入的总量概念。国民收入是全部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或雇员报酬）与营业盈余之和；国民生产净值是劳动者收入、营业盈余及间接税之和；国民生产净值是劳动者收入、营业盈余、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消耗之和。对于部门和企业来说，则分别称之为要素收入、生产净值和增加值。

依据上述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一国资金流量的分析中占十分重要地位，它亦可从这个角度称为“社会资金初始总流量”。从此出发，将社会资金运动过程划分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部分，以及资金形成—资金分配—资金调剂—资金使用四个阶段；将初次分配格局作为资金分配的基础，视国民可支配资金，即国民可支配收入（NDI）格局作为非金融资金分配的终结。

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经济范畴。换言之，没有国民收入概念，宏观总量经济概念就不可能